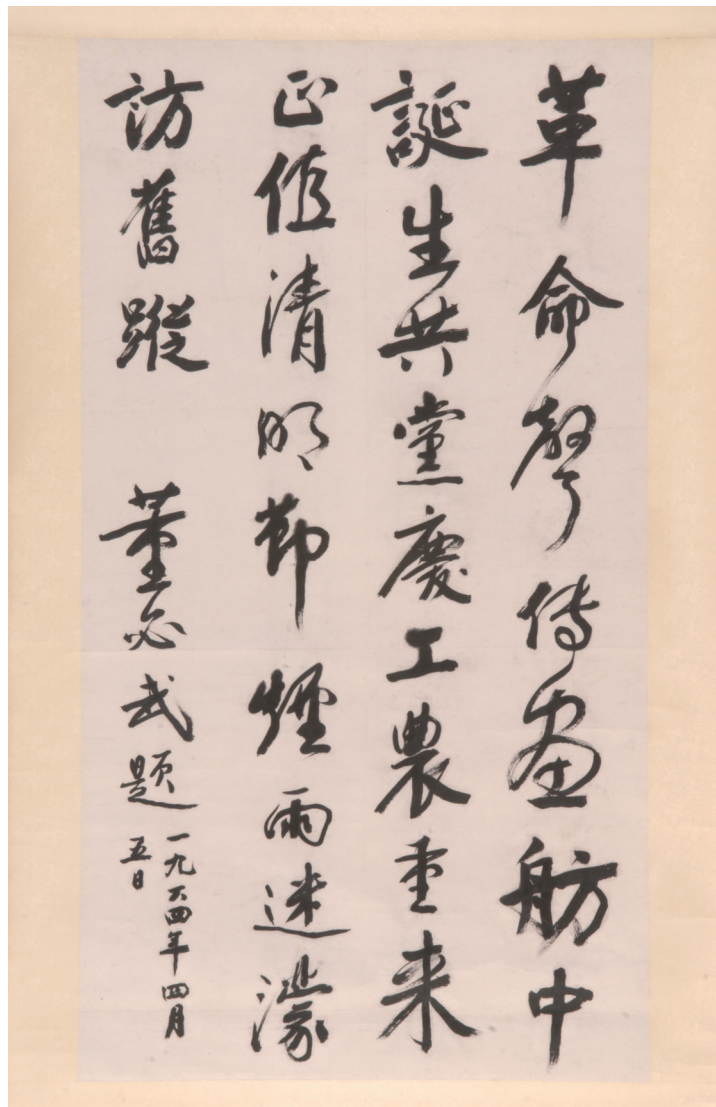


革命文物选萃

1964年董必武南湖题诗



董必武同志重访浙江嘉兴南湖时亲笔题七绝诗，质地为宣纸，纵120厘米，横65.5厘米，一级文物。内文毛笔行书竖写：“革命声传画舫中，诞生共党庆工农。重来正值清明节，烟雨迷濛访旧踪。”左侧中下部落款“董必武题 一九六四年四月五日”。

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完成全部议程，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1959年，南湖革命纪念馆成立，同时按当年开会游船仿制的中共一大纪念船正式对外展出。1964年4月5日上午，正值清明时节，南湖之上细雨迷濛。中共一大代表、时任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同志在浙江省和嘉兴市有关领导陪同下视察南湖。他登上烟雨楼，欣赏雨中南湖的湖波浩渺，认真观看“中共一大史料陈列”，并向随行人员讲述一些党的早期革命活动情况。在会客室稍作休息后，董老前去参观中共一大纪念船。南湖革命纪念馆在1959年筹建之时，曾将纪念船模型送往北京请董老审定。董老执手杖徒步登上纪念船后，仔细察看了船内外，肯定地说：“这条船，我回忆是造得对的，造得成功的。”触景生情，董老想起为革命事业牺牲的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下午，董必武同志回到嘉兴县委接待处后，仍然心情难平，当即挥毫题写了这首诗。

整首诗语言朴实无华，情感深沉凝重，不仅表达了重访南湖寻觅旧踪、缅怀战友的激动心情，更浓缩了中国共产党在嘉兴南湖宣告诞生的伟大历史意义。

(南湖革命纪念馆 陈莉)

红色收音机：永不褪色的革命记忆



斑驳的机身，泛黄的表盘，三个圆形的旋钮因长期使用而褪色，这是山西进步青年——刘鑫使用过的收音机，铭刻着这个青年短暂而光辉的革命生涯。

刘鑫，山西洪洞人，家境贫寒，高小毕业后在杂货铺学徒，在中共太原地下党情报系统负责人赵宗复的影响下，以学校图书管理员的身份从事地下工作。他常常用这台收音机收听新华社的新闻，记录、整理后再分享给其他进步学生。这台收音机里的“红色声音”指引着更多的人走上了革命道路。

太原解放前夕，刘鑫在为了解放军传递重要情报的途中不幸被捕，倒在了黎明前的黑暗中，年仅26岁。他没有看到自己反复收听和憧憬的“新中国”，却用自己的斗争与坚持践行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誓言，为新中国的建立流尽了最后一滴热血。

太原解放后，赵宗复将这台收音机和刘鑫亲笔抄录的《将革命进行到底》手稿捐献给当时的山西省博物馆，希望将这段红色记忆永远传承下去，让人们铭记这些为革命献身的无名英雄。

(山西博物院 韩敏)

用好博物馆这个“大课堂”

刘博洋

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思政教育肩负着重要使命。推动思政教育“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有机融合，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举措。

博物馆作为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殿堂，在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方面具有特殊作用。北京是全国文化中心，拥有丰富的博物馆资源和精彩纷呈的文化展览活动，这一优势为高校开展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融合教学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组织学生参与各类文化场馆的志愿服务，特别是讲解导览等直接服务公众的工作，既能激发学生参与热情，又能带来显著的教育成效。通过参与北京故宫、首都博物馆和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博物馆的志愿讲解工作，笔者深刻感受到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双向融合的育人成效，在实践中领悟到新时代思政教育的丰富内涵与发展潜力。

从馆校合作共建的角度来看，这种教育模式将理论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打破传统课堂的时空限制，通过引导学生深入社会“大课堂”，在真实场景中感知、体悟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思想认知和现实体验的深度互动，充分发挥思政课程铸魂育人的功效。思政课程的传统教学模式主要采用单向度的课堂讲授方式，学生对知识的接受是被动的，容易产生疏离感。而博物馆作为社会“大课堂”，通过实物展示、沉浸式体验、互动交流等方式，能够将抽象的理论转化为直观可感的生动体验。例如北京故宫作为贴近百姓日常和社区生活的中小博物馆，通过千余件藏品展示北京故宫百年故事，成为承载观众集体记忆的文化空间。在志愿服务中，志愿者充分发挥专业特长，运用在学校所学的思政理论和近代史知识，为参观者讲述北京故宫从人力车、有轨电车到新能源公交的发展历程。通过这种讲述方式，观众能够直观感受到城市交通的现代化进程，更深刻理解了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作为城市文明的重要窗口，北京故宫生动展

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和市民生活的时代变迁。志愿者们着力挖掘展品背后的精神价值，将“公交为民”的服务理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结合，把技术设备的迭代升级与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紧密联系，让静态展品焕发出新时代的生机与活力。通过展览，观众能够真切感受到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社会建设和民生改善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在由衷敬佩之余，更激发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在这一过程中，博物馆志愿者服务真正做到“让文物活起来”，充分发挥其文化熏陶、思想启迪和社会教育的功能，帮助观众深入理解文物内涵，引领观众走进文物背后的文化世界，通过情感交流实现文化认同。

从文化传承创新的维度看，博物馆所珍藏的文化遗产体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及其绵延不绝的传承与发展历程。这些遗产展现了中华民族血脉相连、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特质，既是滋养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丰厚沃土，又是向世界展现中华文化魅力的重要窗口。博物馆以得天独厚的优势，用文物讲好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大学生在文博场馆做志愿者，一方面可以满足自己对知识、美学和思想的探索需求，提升科技、艺术、历史等方面的素养，有效激活文化遗产的教育功能；另一方面也回应了学生服务社会的意愿。如在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博物馆中，新旧译本综合编纂的《大宝积经》生动展现了佛教中国化的演变轨迹，为研究唐代佛教传播路线、译经制度及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利鼎和邢公簋作为周代青铜重器，其铭文详细记载了分封仪式、土地赏赐等内容，是研究周代宗法制度、政治体系不可多得的实物证据。这些文物都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来自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志愿者们充分发挥专业优势，挖掘和研究文物背后的哲学思想、文化价值、审美精神、道德理念等，通过文物展示呈现古今文脉，让

观者“一眼千年”。年轻志愿者带来的创新思维和青春活力，不仅为博物馆增添了时代魅力，更让文化遗产保护和思政教育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当下，思政教育不仅要立足本国，还要具备国际视野。博物馆作为文明交流的窗口，不仅能引导学生深入理解多元文化的独特魅力，更能培养其开放包容的胸怀。从文明互鉴的视角来看，大学生的志愿讲解工作有助于推进中西文明交流，也能在对话中淬炼出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以首都博物馆的“希腊人——从阿伽门农到亚历山大”专题展为例，展览从政治、经济、文化的独特魅力，更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探讨了中华文明与希腊文明中的哲学思想、艺术表现和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异同。例如，古希腊的民主制度与中国的“民本”思想有何区别？中西方的艺术表现方式各有什么特点？通过这样的对比，观众不仅能增长知识，还能深刻认识到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宝贵财富。这种跨文化体验使我们深刻感受到人类文明多样性为世界增添了绚丽的色彩，各种文明都凝聚着智慧的结晶。不同文明在碰撞中增进理解，在交流中深化尊重，在互学互鉴中共同繁荣，这一进程不仅推动着人类历史的不断发展，更为文明对话注入了持久动力，夯实了各民族文化自信的根基。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向世界贡献了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丰富多彩的科技文化艺术成果、独树一帜的制度创造，深刻影响了世界文明进程。正如一位志愿者在总结中写道：“通过向观众讲解希腊文明，我将世界上古史知识学以致用。在这一过程中，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中华文明的独特价值，文明互学互鉴才是人类进步的正确道路。”

以上实践都表明，在博物馆开展

“行走的思政课”具有重要教育意义。第一，它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有助于激发学生作为鲜活的生命个体对自身本质力量的确证，从而培养对知识和技能的渴求，提升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观能动性。第二，把思政课程向广阔的社会天地中，为学生提供观察社会、感知社会、参与社会、服务社会的机会，不仅能促进知识学习，更有助于能力锻炼和境界提升，实现知情意行的统一，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第三，思政教育是养人志、育人情操的事业。以广博精深文化资源不断浸润青年学生，必能获得持久的启迪和丰厚的滋养，从而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与奉献精神。一位参与北京故宫志愿服务的同学表示：“当看到小朋友们因我的讲解而对城市发展产生兴趣时，我感受到了服务他人的快乐和价值。”第四，跨文化的讲解经历有助于学生形成开放包容的世界观，增强文明对话能力。只有秉持兼容并蓄的态度，以海纳百川的宽广胸襟汲取其他文明养分，才能达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目的。了解人类社会丰富多彩的文明，能够培养和教育大学生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深刻理解和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深刻认识只有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不断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和影响力，才能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蓬勃发展的文明成果惠及全球。

博物馆作为社会“大课堂”，为思政教育提供了真实、丰富的实践平台，拓展了思政教育的空间维度。通过馆校合作，思政课不再局限于教室，而是走向广阔的社会天地，学生能够在观察、思考、实践中成长。这种打破机构壁垒、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协同育人机制，实现了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的有机融合。未来，应持续深化博物馆与高校的合作机制，积极拓展“馆校共建”的创新模式，通过打造沉浸式、互动式的思政教育实践平台，推动文化资源与高校育人体系深度融合，让思政教育在博物馆这个“大课堂”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推出“天方奇毯”大展

90件珍贵文物展示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交融互鉴

王娟

近日，“天方奇毯——伊斯兰与世界文明的交织”（简称“天方奇毯”展览）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揭幕。该展览是香港首个聚焦伊斯兰艺术的展览，突显了萨法维王朝（1501至1736年）、莫卧儿王朝（1526至1857年）和鄂图曼王朝（1299至1923年）的非凡艺术和工艺，也展现了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之间的深远联系。展览由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和卡塔尔多哈伊斯兰艺术博物馆联合主办，展出90件珍贵文物，包括地毯、瓷器、金属工艺品、彩绘手稿及玉器等。展品主要来自多哈伊斯兰艺术博物馆的重要馆藏，也有来自故宫博物院和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珍藏。

15幅巧夺天工的地毯蔚为奇观

“天方奇毯”展览分为四个单元，展示萨法维、莫卧儿和鄂图曼王朝的艺术结晶，并追溯自10世纪以来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跨文化交流。多哈伊斯兰艺术博物馆的收藏闻名遐迩，这次展出的90件瑰宝，77件为该馆藏，不少更是首度在该馆以外地方展出。

地毯是伊斯兰艺术中最大型的表现形式。展览所展示的宫廷地毯由技艺高超的织工精心制作。每幅地毯皆采用上乘材料，包括丝线、帕什米纳羊毛、金线和银线，再以来自世界各地的染料进行染色。展览中15幅巧夺天工的地毯珍品，均生产于16至18世纪的萨法维伊朗、莫卧儿印度、鄂图曼土耳其和中国。重点展品包括具有450年历史、萨法维君主赠予威尼斯总督的萨法维王朝苏莱曼一世“打猎”图地毯；长约16米的海得拉巴凯沃基安地毯，是为莫卧儿印度南部海得拉巴的苏丹宫殿编织的；带有代表先知凉鞋图案的如意宝珠礼拜毯，上面亦有鄂图曼宫廷流行的吉祥图案纹样。另一件重要展品是来自故宫博物院藏的花瓣纹栽绒地毯，产于清乾隆年间（1736至1795年）新疆地域，属一级文物。

聚焦两个地域千年文化交流

“天方奇毯”展览囊括多种伊斯兰艺术品，如书籍装帧、细密画、陶瓷、金属工艺品和玉器，展示各种艺术



多媒体项目“大马士革厅”

形式间的相互关系。重点展品包括萨法维王朝苏莱曼一世所藏《古兰经》，对开本波斯文学名著《列王纪》等。来自中华文明和伊斯兰艺术的艺术精品并排展示，勾勒出两个地域之间引人入胜的交织：一件13世纪中叶的嵌银金黄铜盆，与一件形状相似、产自明代景德镇的青花缠枝莲纹折沿盆联袂展出。重点展品还有17世纪印度莫卧儿王朝制作的十曲花耳碗，上面刻有乾隆皇帝咏赞的诗句。

“天方奇毯”展览通过展示伊斯兰艺术的非凡工艺，回顾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数个世纪以来的文化艺术交流，以及由此建立的互联互通精神，启发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深入领略不同文化在艺术和历史层面的交织，感受它们跨越时空的联系。

互动体验，创新学习方式

博物馆利用数字方式重塑多哈伊斯兰艺术博物馆备受青睐的“大马士革厅”，引领观众感受鄂图曼精致奢华的待客场面。这间通过数字装置重现的接待室，原本是19世纪大马士革一个富

家住宅的一部分，融合了鄂图曼、波斯、印度和欧洲风格，反映出当时这座既是首都、也是国际商业和文化交流中心的城市，汇聚了多元文化特色。另外，观众可利用手机启动增强现实（AR）程序，拍摄自己与飞毯合影的画面。

适合不同年龄观众的“魔毯大冒险”亲子观赏路线贯穿整个展览。展览最后部分设有“地毯工坊体验”学习长廊，通过纺织品样本展示和地毯设计互动游戏，增进观众对地毯制作和图案设计的了解。博物馆还提供了导览员定点现场讲解、语音导览、公开讲座和教学资源手册，让参观者更加深入认识伊斯兰艺术，开启与中华文化的历史对话。为了提升本地和海外观众的参观体验，博物馆推出多个语言版本的展览解说。除中、英文展墙文字外，观众还可通过扫描现场二维码，阅读阿拉伯文、日文和韩文的说明文字。

博物馆礼品店推出专门为这次展览设计、富有时尚感的针织手挽袋。手挽袋以现代图案装饰，灵感来自重点展品——一匹缀有花朵的萨法维王朝华丽丝织品。博物馆礼品店亦推出超过20款主题产品，包括伊兹尼克器皿、文具、时尚精品和书籍等。



花瓣纹栽绒地毯 故宫博物院藏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供图)